

卢卡奇对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

陈学明 陈悦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 :纵观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当今人类的存在状态,会越发感到卢卡奇在90多年前写的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对在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揭示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卢卡奇的这一论述的现实意义就在于能使我们看清当今人的那种存在方式的实质与危害。尽管我们知道人类不可能也不应该因为市场经济使人生活在这样一种存在状态之中,存在着这样的负面效应,而放弃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告别”市场这只给人类带来无穷财富的“看不见的手”,但是,人类也不应当对与市场经济如影随形的这种人的存在方式熟视无睹。人类必须在维持市场经济机制的同时,切实改变目前的这种存在方式。如果这样去认识,那么卢卡奇对在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揭示的意义就会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关键词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人的存在方式 ;原子化 ;物化意识

作者简介 :陈学明(1947—),男,上海崇明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陈悦(1976—),男,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项目编号:11JJD710001)的中期成果。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4)01-0028-11 收稿日期 :2013-10-24

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做出了长达30多年的研究,无疑,“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成了我国的一门“显学”。但十分遗憾,纵观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连篇累牍的研究,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或者说,很少有人从人的存在方式的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加以探讨。而实际上,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

体系中,最具创意的恰恰就是其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更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理论随着时代的演变,随着人日益面临严重的存在危机,越来越显示出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他的这一著作,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同时也为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代表人物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我们这里就以这一著作作为主要依据,着重剖析卢卡奇对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即在一切都成为商品的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

—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论文集,收集于其中的每一篇论文都涉及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但对人的存在方式做出真正全面论述的是书中篇幅最长的那篇论文,即《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那篇论文的一开头,卢卡奇引用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中下述名言作为“题记”：“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111} 通读整篇论文可以知晓,卢卡奇在这里之所以要把马克思的这段名言首先鲜明地呈现在作者面前,是有深刻用意的。卢卡奇除了要表明研究人本身,特别是研究人的存在状态,就是抓住了这个世界最根本的问题之外,还要进一步说明,要真正认识当今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存在状态,必须紧紧地把握当今商品范畴已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商品的光芒已照射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这一社会存在的“根本”。他这样说道,“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2]143}。他这里所说的“主体性形式的原形”指的就是人的存在状态。他所强调的是,只有把人置于当今社会的“商品关系的结构中”才能把人的存在状态揭示出来。

卢卡奇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商品交换及其结构性后果”对“整个外部的和内部的社会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商品交换”完全构成“社会进行新陈代谢”的“支配形式”。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产本身,是为了交换价值而不是为了使用价值,即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要,而在于使一些人拥有更多的钱。在这一基础上,商品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即“商品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使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商品化,都进入交换领域。

卢卡奇还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

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进一步强调,“商品形式向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的这种转化,“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出现”^{[2]146}。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也有商品交换,但由于这种商品交换没有成为“普遍范畴”,因而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非常有限。他这样说道:“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具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2]144} 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具有这种质的区别,关键还在于生产目的的不同。他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点:“产品进行交换的数量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之所以取得商品形式,是因为它们是可以交换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同一个第三者的表现。继续不断的交换和比较经常的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再生产,日益消除这种偶然性。但是,这首先不是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为了二者之间的中介人,即把货币价格加以比较并把差额装入腰包的人。”^{[3]368-369} 在卢卡奇看来,全部问题就源自于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者也不是为了生产者,而是为了使一些人的腰包装得更满。

一旦是为了“使一些人的腰包装得更满”而进行生产,就会“对所有生活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使人的存在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人的存在状态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处于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之下的人的存在状态究竟是如何的呢?这正是卢卡奇所倾心关注和着重研究的。

卢卡奇用“物化”(reification)这一概念来说明商品形式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形式后的人的存在状态。对“物化”的具体含义,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已表述得十分清楚。他主要是指马克思下述一段话:“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4]88-89} 按照

卢卡奇的解释,马克思在这里所描述的“物化”最贴切地说明了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存在状态。这里最关键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所有痕迹”^{[2]143-144}。这就是说,所谓“物化”,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物与物的关系获得了“幽灵般的对象性”,具有“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而正是这一“幽灵般的对象性”和“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把人与人之间的本来的属性掩盖掉了。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最基本的存在状态是仅仅作作为一种“物”而存在着,人与他人之间的关联也就是一种“物”与另一种“物”之间的关系。

卢卡奇反复强调的是,“商品只有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时”,商品的那种本质才会暴露无遗,而与此同时,在“商品关系”的基点上所形成的人的“物化”的存在状态“才对社会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也只有在“商品关系”的基点上,才会出现“人的意识屈从于这种物化所表现的形式”这种情形,而任何企图理解和反抗“物化”都会造成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的“灾难性后果”,并且也从而产生从“物化”这种存在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强烈愿望。卢卡奇还提出,关键在于,人明明处于“物化”状态而还感觉不到“物化”,而随着商品形式越来越成为一种统治的形式,人的这种麻木性也越来越严重。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人们实际上还能意识到“经济关系的人的性质”,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实际上已很难“看清这层物化的面纱”。他这样说道:“而商品形式向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的这种发展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出现了。因此,毫不奇怪,在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之时,经济关系的人的形式有时看得还相当清楚,但是,这一发展越继续进行,产生的形式越错综复杂和越间接,人们就越少而且越难于看清这层物化的面纱。”^{[2]146}

二

卢卡奇在论述“物化”这种人的存在状态时,着重剖析了人的劳动的“物化”。在他看来,普遍的商品关系对人的存在状态带来的最大的影响表

现在劳动上。具体地说就是“人自己的活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2]147}。劳动明明应当是人自己的活动,而现在却成了与自己相对立的东西,人自己非但不能控制它,而且反而受其控制,这就是“劳动的物化”。人活在世上最基本的活动,亦即最基本的存在状态是劳动,现在劳动这种最基本的活动、存在状态也不属于自身了,而是成了“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的揭示之所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关键在于他紧紧抓住了人的劳动这种存在状态做出了尖锐和深刻的分析。

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的“物化”,人的劳动这种存在状态的“非人化”,既表现在“客观的方面”,又见之于“主观的方面”。他所说的“客观的方面”就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它的规律虽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无法制服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因此,虽然个人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这种规律的认识,但他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现实过程本身。”^{[2]147}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一个客观世界,这一客观世界由“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构成,这一客观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地运动变化着的商品世界,显然这一客观世界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但现在它却“作为无法制服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人尽管可以为自身的利益利用这一客观世界的规律,但却无法对这一客观世界做出改变。人正与自身创造的客观世界相对立,这就是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在劳动上的第一个方面的真实的存在状态。他所说的“主观的方面”则是:“人的活动同人自身相对地被客观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活动。”^{[2]147-148}卢卡奇在论述人的劳动的“物化”的“主观的方面”时,特地注明“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2]147}。他的意思是说,一旦商品经济占了主导地位,那么不仅是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客观世界,而且连人自身的劳动本身也不属于劳动者了,具体地说,人自身的

劳动变成了商品,它“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完全不受人控制,而是反过来控制人。人正与自己的活动相对立,这就是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在劳动上的第二个方面的真实的存在状态。为了论述这“第二个方面的存在状态”,即表现在“主观方面的人的劳动的物化”,要比“第一个方面的存在状态”,即表现在“客观方面的人的劳动的物化”更具有根源性,他转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加以说明:“因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起来。”^{[4]193}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劳动力仅仅是作为一种商品形式归劳动者所有,由此劳动产品也就成了一种商品形式而“普遍起来”。无论是劳动力还是劳动产品,只要具有了商品形式,即作为一种商品而存在,那么实际上它们都已不属于劳动者了。当然,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前提和条件。

卢卡奇还进一步用“劳动的抽象”来概括人的劳动的“物化”,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的“物化”用哲学的语言表述就是使“具体的劳动”变成“抽象的劳动”,“抽象劳动”构成了现实的原则。如果从人的存在状态的变化来看,那么这一变化就是劳动这种存在状态从具体的变为抽象的。与在论述劳动的“物化”时他从“客观的方面”和“主观的方面”分别加以说明相一致,他也是从“客观的方面”和“主观的方面”分别剖析“人类劳动的抽象”的。他说:“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2]148}至于“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客观方面”是如何制约着“人类劳动的抽象”的,他是这样论述的:“在客观方面,只是由于质上不同的对象——就它们自然首先获得自己作为商品的对象性这一方面而言——被理解为形式相同的,商品形式作为相同性的形式,即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可交换性形式才是可能的。在这方面,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形式相同性原则只能依据它们作为抽象的(即形式相同的)人类劳动的产物的本质来创立。”卢卡奇在这里说的是,借助于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性质上各不相同的对象按照形式相同的原则被转变为可相互交换的商品。这些在性质上各不相同的对象具有形式上的相同性,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

一点,它们实际上是作为“抽象的、形式上相同的人类劳动的产物”而被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一结果只能通过主观方面把人的劳动变成形式相同的抽象劳动才能达到。这样,卢卡奇又从“在客观方面”制约着“人类劳动的抽象”进一步追溯到“主观方面”制约着“人类劳动的抽象”:“在主观方面,抽象人类劳动的这种形式相同性不仅是商品关系中各种不同对象所归结为的共同因素,而且成为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在这里只要确定,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即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和前提的资本主义分工的劳动,只是在自己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只是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才成为一个这样的社会范畴,这个社会范畴对这样形成的社会的客体和主体的对象性形式,对主体同自然界关系的对象性形式,对人相互之间在这种社会中可能有的关系的对象性形式,有决定性的影响。”^{[2]148-149}卢卡奇在这里不仅指出了“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对人的劳动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使这种劳动成为“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成为“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而且揭示了这种人类劳动的抽象性已经成为“现实原则”和“社会范畴”,即成为支配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其他方面的普遍的、现实的原则。他在这里具体地指出了“人类劳动的抽象性”,即把人的具体劳动变为可以计算的抽象劳动所产生的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形成了社会的客体与主体的对象性形式,即破坏了客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而是使两者相对立;形成了主体与自然界关系的对象性形式,即自然界对人来说本来是伙伴,现在变成了对立物;形成了人相互之间关系的对象性形式,即人与人之间原本是和谐的,如今人与人之间成了一种对抗的关系。卢卡奇所分析的人类劳动抽象化所带来的这三个方面的消极影响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三

卢卡奇认为,贯穿于人类劳动“物化”、“抽象化”的是人的劳动越来越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他抓住“合理化”展开论述,不仅把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劳动的特征的分析,而且把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存在状态的分析,都引向了深入。“合理化”不仅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劳

动的主要特征,而且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存在状态的重要标志。他这样说道:“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2]149}在他看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合理化也在不断增加,蕴涵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是合理化原则的日益强化,而伴随这一过程的则是劳动者的个性的不断消失。

对于合理化的具体内容他也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揭示:其一,“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重复的专门职能”^{[2]149}。卢卡奇在这里讲得十分清楚,劳动的合理化首先是“劳动过程的合理化”,而所谓“劳动过程的合理化”指的是人的劳动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人在劳动中所从事的是一些机械的、重复的动作,劳动者的劳动与作为整体的劳动产品不再具有直接的联系。其二,“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以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它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人相对立),都被提出来了”^{[2]149}。卢卡奇所说的第二个方面的合理化是由第一个方面的合理化,即“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带来的,它指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提出来,对劳动定额进行合理的计算。劳动定额一旦进行这样的计算,那它就“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人相对立”。卢卡奇认为,严重的是,“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观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2]149}。当这种合理性浸透到人的心理世界,人的心理世界也开始注重“算计”,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而“被客观化”,那确实如卢卡奇所说的问题变得十分严重。

卢卡奇认为,合理化原则就是“可计算性”。他指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

合理化原则。”^{[2]149}如果要真正搞清楚“合理化”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必须进一步追溯“可计算性”,即“一切依赖于计算”所造成的后果。他主要分析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后果:

其一,劳动产品的被分割。“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要求破坏产品本身的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所决定的统一。”^{[2]149}在他看来,关键在于,既然对所应达到的结果必须预先做出越来越精确的计算,那么只有通过“把任何一个整体最准确地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研究那些“局部的规律”,才能实现所谓的“合理化”。与对整个产品进行有机生产的“生产方式”决裂,既是“可计算性”的前提,也是其必然结果。“没有专门化,合理化是不可思议的。”^{[2]150}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产品不再是劳动过程的对象”,即作为劳动过程的对象和产物的劳动产品,必然被割裂而不具有统一性。劳动过程已变成成为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客观组合”,而这种“局部系统的统一性”则纯粹是由计算所决定的,从而局部系统之间即使存在着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显然是偶然的而不具有必然性。卢卡奇的基本判断是: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必然导致破坏劳动产品的有机统一性。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对劳动过程的合理—计算的分析,消除了相互联系起来的和在产品中结合成统一体的各种局部操作的有机必然性。”^{[2]150}

其二,劳动主体的被分割。“生产的客体被分成许多部分这种情况,必然意味着它的主体也被分成许多部分。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与这些抽象的局部规律按照预先合理的估计起作用相对立,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2]150}对劳动过程进行计算,实际上是对劳动者的劳动进行计算,这实质上也是对作为人的“劳动者”进行计算。而这样一“计算”,劳动者作为人的性质与特点就被割裂了,对劳动者的劳动的这种计算显然是与劳动者的那些作为人的性质与特点相对立的。在卢卡奇看来,这正是造成在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一切错误和罪恶的根源之所在。其直接后果是:“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现这一机械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行的,他不管愿意与否必然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2]150-151}卢

卡奇的这段话告诉人们,对劳动者的劳动进行计算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使劳动者不再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人,劳动者仅仅作为一种劳动工具在运作,仅仅作“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纳入进“某一机械系统里去”,这一“机械系统”完全独立于劳动者,不管劳动者是否愿意,劳动者除了服从它是没有其他选择的。按照卢卡奇的分析,这里最关键的是,劳动者被实在地抽象为纯粹的量。

在“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所造成的这两个方面的后果中,卢卡奇特别关注第二个方面的后果,即劳动者本身的被割裂。他说,伴随那种“科学—机械地被分割开来的和专门化的劳动”的是,“劳动主体必然相应地被合理地分割开来”^{[2]152}。他特别强调这种“分割”的“合理性”,即从“可计算性”来看完全是“合理”的。对此,他又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其一,劳动者的“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即他们的劳动同其整个人格相对立的客观化变成持续的和难以克服的日常现实”,“以至于人格在这里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他自己的现存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2]152}。卢卡奇在这里说的是,在“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的支配下,劳动者的劳动力同其自己的整个人格相对立这一点已经作为“常态”被“客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人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作为“现存孤立的分子”被一体化到“异己的系统中去”。其二,“生产过程被机械化地分成各个部分”,必然“切断了那些在生产是‘有机’时把劳动的各种个别主体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联系”^{[2]152}。卢卡奇在这里指出,生产本来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而当生产是“有机”时,参于生产的各种个别主体必然会“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而如今生产已不再是“有机”的了,生产过程已被“机械化”地分割开来了,这样也就必然“切断”了原先把各种个别主体借助生产“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联系。卢卡奇强调指出:在这一方面,“生产的机械化”把劳动者“变成孤立的原子”,“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2]152}。

四

卢卡奇用“孤立化”、“原子化”来概括“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对

劳动者所带来的割裂。“孤立化”、“原子化”是卢卡奇所描述的在商品形式所支配的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的存在状态。

在阐述“孤立化”、“原子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状态的过程中,卢卡奇深刻地提出了“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的著名命题。他说:“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了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2]151}他所说的“直观的态度”首先是指“把空间和时间看成是共同的东西,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2]151}。为了说明“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这种“直观的态度”的具体含义,他特地引述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的相关论述。马克思说,“由于人隶属于机器”,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象它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工时是等值的,更确切地说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时间的体现。现在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対时,天对天……”^{[5]96-97}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在这样一种境况下,“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体”,亦即“凝固成一个空间”^{[2]151}。而当“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劳动者必然被抽象为他身上所装载着的一定的劳动时间。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劳动主体“在这种抽象的、变成物理空间的时间里”,必然“相应地被合理地分割开来”,即被合理地“孤立化”、“原子化”^{[2]151-152},劳动主体被抽象化、量化的过程也就是被“孤立化”、“原子化”的过程。

卢卡奇强调,“孤立化”、“原子化”成为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他认为,“这样产生的孤立化、原子化”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是资本主义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映。^{[2]153}个人的原子化只是以下事实在意识上的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

定。^{〔2〕154}他的意思是说,当整个社会都受商品经济所控制,一切都成为商品,社会的所有成员的命运也受制于这种商品经济之时,人就会呈“原子化”状态。他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是,人的呈“原子化”状态看上去是一种“表面现象”,但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表面现象”。“这种表面现象是一种必然的表面现象;也就是说,个人的实践中和思想上同社会的直接接触,生活的直接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方面,对于个人来说,所有‘物’的商品结构和它们的‘自然规律性’,却是某种现成碰到的东西,某种不可取消的已有之物——只能以孤立的商品所有者之间合理的和孤立的交换行动这种形式来进行。^{〔2〕154}这说的是,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个人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思想上”同社会的任何接触,个人生活的“直接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身,都不可避免地趋向于“原子化”和“孤立化”。“一切都成为商品”,“一切必须以交换的形式进行”,这是任何人必须面对的,都以“某种不可取消的已有之物”让人们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人只能把自己也当成某种“孤立的商品”,只能在各个“孤立的个体”之间从事交换,这就是他们不可选择的生存形式。“工人必须作为他的劳动力的‘所有者’把自己想象为商品”,“他的特殊地位在于,这种劳动力是他惟一的所有物。就他的命运而言,对于整个社会结构有典型意义的是,这种自我客体化,即人的功能变为商品这一事实,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的性质”。^{〔2〕154}在卢卡奇看来,人的存在状态呈“孤立化”、“原子化”,实际上就是劳动者的“自我客体化”,亦即“人的功能变成商品”,而这一点充分表明,“商品关系”是一种“非人的关系”,即商品关系是同人的本性完全对立的。

卢卡奇还指出,“孤立化”、“原子化”看上去只是劳动者,工人的存在状态和命运,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命运。“工人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这种命运的普遍性的确是工厂劳动过程在这个方向上发展的前提。^{〔2〕153}卢卡奇在这里强调的是,整个社会的“孤立化”、“原子化”甚至是劳动者的“孤立化”、“原子化”的前提。在他看来,其理由十分简单:首先,“因为只有当‘自由的’工人产生了,他能够把他的劳动力作为‘属于’他的商品,作为他‘拥有’的物自由地放到市场上出卖时,劳动过程的合理化机械化

才是可能的^{〔2〕153}。这就是说,只有在形成“自由的工人”的条件下,只有当工人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所拥有的“物”放到市场上出场之时,劳动过程才能实现合理化、机械化,即劳动者才能借助于劳动呈“孤立化”、“原子化”;其次,“只有在整个社会生活按此方式细分为孤立的商品交换行动时,‘自由的’工人才能产生出来;同时,他的命运也必须成为整个社会的典型的命运^{〔2〕153}。这是说,要形成“自由的工人”,整个社会生活必须划分为“孤立的商品”并纳入交换的体系。卢卡奇认为,关键在于不仅要明确,当“孤立化”、“原子化”成为人的主要存在状态之时,就意味着原先的那种“人的关系的自然关系”已被“合理物化的关系”所取代,而且必须知晓正是所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条件在促使实现了这种取代。他这样说道:“生产者同其生产资料的分离,所有自然生产单位的解体和破坏等等,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所有经济—社会前提,都在促使以合理物化的关系取代更明显展示人的关系的自然关系。^{〔2〕153}在卢卡奇看来,认识“孤立化”、“原子化”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存在状态和命运,即认识“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必须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这一点特别重要,只有认识了这一点,才能充分理解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下述现象的本质和危害性:“满足需要的各种物品不再表现为某一共同体的有机生活过程的产品,而是一方面表现为抽象的类样品,另一方面表现为孤立的客体。^{〔2〕153}

五

在卢卡奇看来,最严重的是这种以“孤立化”、“原子化”为主要标志的“物化”的人的生存方式还渗透进了人的意识,形成了人的“物化”意识。他说:“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浸入人的意识里。^{〔2〕156}“分工像在实行泰罗制时侵入‘心灵领域’一样,这里也侵入了‘伦理’领域。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并没有削弱作为基本范畴的物化意识结构,而是加强了它。^{〔2〕163}“分工中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2〕162}卢卡奇对“物化”的存在方式的批判是同“物化”意识的批判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意识的形成标志着“物化”已严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卢卡奇这样说道：“世界上的这种表面上彻底的合理化，渗进了人的肉体 and 心灵的最深处，在它自己的合理性具有形式特性时达到了自己的极限。”^{[2]164}这种机械化、合理化一旦进入到了“人的肉体 and 心灵的最深处”，在这一“最深处”也为机械化、合理化所控制了，那就说明这种机械化、合理化已“达到了自己的极限”。他还这样说道：“商品关系变为一种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物，这不会停止在满足需要的各种对象向商品的转化上。它在人的整个意识上留下它的印记：他的特性和能力不再同人的有机统一相联系，而是表现为‘占有’和‘出卖’的一些‘物’，像外部世界的各种不同对象一样。根据自然规律，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人使他的肉体 and 心灵的特性发挥出来的任何能力，越来越屈从于这种物化形式。”^{[2]164}卢卡奇在这里不但指出了商品关系的“物化”，即商品关系的“物化”必然要在人的意识上“留下它的印记”，而且揭示出人的意识一旦“物化”了，那么人的特性和能力都将成为“为人‘占有’和‘出卖’的一些‘物’”，都将“越来越屈从于这种物化形式”。

卢卡奇在论述“物化”意识时强调停留于“直接性”(immediacy)是其重要特征。他说：“这种合理的客体化首先掩盖了一切物的——质的和物质的——直接物性。当各种使用价值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商品时，它们就获得一种新的客观性，即一种新的物性——它仅仅在它们偶然进行交换的时代才不具有，它消灭了它们原来的、真正的物性。”^{[2]164}在卢卡奇看来，合理化的过程就是使对象失去本真的“物性”的过程、掩盖一切对象的本真的“物性”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是使对象获得一种新的“物性”，一种曲解对象、不能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物性”。而“物化”意识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只能“直接地”停留于对象所新获得的“物性”，把这种曲解、表面化的对象的“物性”误认为是对象唯一的、本真的“物性”。“物化”意识的“直接性”就在于它不可能达到对象的深层的“物性”。而“物化”意识之所以只能停留于“直接性”，关键在于它缺乏“中介”，即面对着对象，它根本没有能力通过多重“中介”让对象的结构呈现出来，并借助于这个结构让对象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没有了“中介”，“物化”意

识除了获得一些“抽象的量的规定性”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呈现在“物化”意识中的世界只是一个“永恒的、平面的”世界。卢卡奇还强调，“物化”意识停留于“直接性”，“清楚地表现出资本主义主体行为的直观性质”。“资本主义主体行为”实际上是围绕着“合理计算”展开的，而“合理计算”的本质“最终是以认识到和计算出一定事情的必然的、有规律的过程为基础的”，显然，假如“人的行为仅限于对过程成功的可能性做出计算”，那么“经常甚至停留在这样一些‘规律’可能发生作用的概率计算上面”，而不企图深入到事物本身就变成是顺理成章的了。^{[2]161}卢卡奇反复强调“事实”与“现实”这两个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平时人们所说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事物的“现象”，而“现实”才是事物的“本质”。“物化”意识永远只能停留于“现象”而不能达到“本质”，也就是说，在“物化”意识那里，所有认识都只是关于“事实”的认识，而不是关于“现实”的认识。

卢卡奇认为，“物化”意识停留于“直接性”的过程也是丧失“总体性”的过程。行为主体丧失“总体性”，是意识“物化”的必然结果。“由于工作的专门化，任何整体景象都消失了”^{[2]168}，也就是说，处于“专门化”工作状态下的人们，其脑海里是不可能具有“整体景象”的。卢卡奇把“总体性”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他明确地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2]176}在卢卡奇看来，具体的、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对于辩证法、思想史最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总体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主要内容。他极其重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而他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握总体性，亦即“保持对总体性的渴望”。在他看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分水岭就是能否把握总体性。而只有无产阶级产生了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并据此为其争取自身生存、发展的权利而改变着世界的时候，历史发展才真正从自为走向自觉。卢卡奇把“物化”意识作为总体意识的对立面加以抨击。历史要求无产阶级把握总体性范畴，可实际上，无产阶级往往不具备这种

意识。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处于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的社会之中,就在于其基本的生活方式是“孤立化”、“原子化”的。无产阶级一旦被这种“物化”意识占据头脑,就再也看不到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只能被局部的、眼前的利益牵着鼻子走。卢卡奇不但正确地分析了作为总体意识的对立面的“物化”意识的主要表现,而且还精辟地指出了这种“物化”意识的形成过程及其危害性。

卢卡奇进一步指出,“物化”意识不仅渗透于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人的头脑之中,而且还在理论上有多重体现。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科学都是“同样陷入这种直接性之中的科学”,都“把现实的总体分割成了一些部门”,都“由于专门化而看不到整体了”^{〔2〕168}。这些资产阶级科学看似在把握社会的整体,可实际上它们所能达到的只是关于这一社会的抽象的、直接的知识,根本不可能具有总体性的高度。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非常成功的完全的合理化,即把它运用于一种抽象的、尽可能数学化形式的规律系统,才形成理解这种危机的方法论上的局限性”^{〔2〕170}。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时候,在方法论上采取了抽象的办法,从而排除掉了内容,其结果因无力穿透内容而只能停留于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直观。资产阶级法学比起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它的看法的物化更为有意识一些”,因为它“只不过把法律看成一种形式上的计算体系,借助于此,一定行为的法律结果就可以尽可能精确地计算出来”^{〔2〕172-173,174}。当然它不得不承认其无力把握内容,无力达到总体的高度。卢卡奇指出,当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法学在内的资产阶级的科学都不能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景象”之时,人们“希望等待能由一种综合性的科学,即由哲学来实现整体的联系”,但实际证明,人们对资产阶级哲学的这种期望是“多么的徒劳”。“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当哲学通过对问题的完全另外一种提法,通过专注于可认识事物、被认识事物的具体的、物质的总体来突破这种陷入支离破碎的形式主义限制时,才是可能的”,但显然,“资产阶级社会的哲学必然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2〕175}。他特地对此做出了解释:“这不是说,好像它没有对综合的渴望;也不是说,好像那个社会中最优秀的人物乐于接受敌视生活的存在机械论和与生活格格不入的科学形式主义。但

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要使立场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2〕175-176}卢卡奇在这里再次强调,在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即商品经济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的情况下,要让哲学担负起认识社会的整体的使命是不可能的。

卢卡奇在论述“物化”意识如何丧失“总体景象”时强调,丧失“总体景象”的“物化”意识与人的“孤立化”、“原子化”的生存方式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商品形式的占支配地位,以及相应的人的生活方式的“孤立化”、“原子化”滋生了“物化”意识,使人的意识丧失“总体景象”,使人不再具有“对总体的渴望”;另一方面,这种停留于“直接性”、丧失“总体景象”的“物化”意识,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孤立化”、“原子化”的人的存在方式。

六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我们之所以特地在该书如此眼花缭乱、无所不至的内容中专门摘取他关于“物化”状态的若干论述,并以“人的存在状态批判”为题,单独加以剖析,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他的这些论述,太具有现实意义了。

卢卡奇所说的“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实际上就是实施市场经济的社会。从20世纪后半叶起,全世界在“别无选择”论的鼓噪下,沿着不同的路径都走向了市场经济。西方原先有两种经济模式,即“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和“莱茵资本主义”,前者是“完全的市场资本主义”,后者比较而言市场化并不那么彻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前者呈“压倒”、“降服”后者之势。而在东方,改旗易帜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完全倒向了市场经济不消说,就是那些仍然以社会主义自称的国家和地区也大多相继选择了市场经济模式,尽管它们在市场经济前加上了“社会主义”这一限制词。卢卡奇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所说的商品范畴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进入交换领域,在当今的世界真的完全兑现了。

问题在于,让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究竟给人带来了什么?无疑,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它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0世纪下半叶起,生活在地球的各个地方的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

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具有必然性。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一种中性的机制,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当今人类社会要发展自己,必须利用这种机制。可是,正当人们越来越认可市场经济,并陶醉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之时,实际上市场经济之手也正把人们引入另一种新的生活状态之中。

纵观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当今人类的存在状态,会越发感到卢卡奇当年对在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揭示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卢卡奇的这一论述的现实意义就在于能使我们看清当今人的那种存在方式的实质与危害。尽管我们知道人类不可能也不应该因为市场经济使人生活在这样一种存在状态之中,存在着这样的负面效应,而放弃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告别”市场这只给人类带来无穷财富的“看不见的手”;但是,人类也不应当对与市场经济如影随形的这种人的存在方式熟视无睹,不应当为了财富的增加而就这样活下去。人类必须在维持市场经济机制的同时,切实改变目前的这种存在方式。如果这样去认识,那么卢卡奇对在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揭示的意义就会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卢卡奇当年所说的一切,可以说今天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他用“物化”来表述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物与物的关系获得了“幽灵般的对象性”。当今人际关系不就是这样一种冷冰冰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吗?卢卡奇把“物化”主要归结为人的劳动的“物化”,他说,不但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世界正“作为无法制服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而且人的活动本身也“同人自身相对地被客观化,变成一种商品”,这不也正是今天人们劳动的真实状态吗?他又把劳动的“物化”与“抽象性”联系在一起,他说,人的具体劳动正变为可以计算的抽象劳动,人类劳动的抽象性已经成为“现实原则”和“社会范畴”,在当今不也正是既可从“客观方面”又可从“主观方面”看到这种“抽象性”的负面作用吗?他又把劳动的“物化”追溯到“合理性原则”和“可计算性原则”,他说,“用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的支配下,劳动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作为“现存孤立的分子”被

一体化到“异己的系统中去”,当今不也正是把“合理性”和“可计算性”奉为至高无上,以至人本身也成了处处“被计算”和“加以合理化的”对象了吗?他进而把“孤立化”、“原子化”概括为在商品形式所支配的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的存在状态,他说,人的存在状态呈“孤立化”、“原子化”,实际上就是劳动者的“自我客体化”,亦即“人的功能变成商品”,而且正成为整个社会的存在状态,走向“孤立化”和“原子化”不也正是今天人类的普遍命运吗?卢卡奇对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揭示,是对我们的一种警示,提醒我们:我们实际上正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之下,而这种存在状态是一种“非人”的生活方式。

卢卡奇对在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人的“物化”的存在方式的揭露与批判,是同对这一社会中人的“物化”的意识的揭露与批判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最严重的是“物化”的人的生存方式还渗透进了人的意识,形成了人的“物化”意识,“物化”意识使人的思维停留于“直接性”上,而“物化”意识停留于“直接性”的过程也是丧失“总体性”的过程,也就是说,使人失去了全面地、总体地认识问题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重心放在对“物化”意识的批判上。对“物化”的意识的批判是该书批判的主线,而对“物化”的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则是该书批判的辅线。从认识在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的人的存在方式的角度看,卢卡奇对在这一社会中人的“物化”意识的批判的启发意义在于,它告诉人们:为何人明明生活于处处被“算计”,被“合理化”,日益走向“孤立化”、“原子化”的“非人”状态,明明本来应是实现自身的“具体劳动”却越来越变成“抽象劳动”,无论是劳动的产品还是劳动的过程都反过来对抗自身,明明本来应是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获得了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却无法认清自己的这种真实处境,甚至还把痛苦的“非人”的生活当作幸福的生活来接受。在卢卡奇看来,关键就在于人的意识也被“物化”了。随着商品形式逐渐占支配地位,一方面人的存在方式越来越“物化”了,另一方面人的意识也日益“物化”。一旦人的意识也“物化”了,那么人“越来越少而且难于”认识到自己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存在状态,自己究竟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纵观

当今社会,显然也存在着明明处于异化的状态之下却感觉不到异化的存在,把异化的生活当作幸福的生活来接受的情况,这一点与卢卡奇的时代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卢卡奇关于商品形式占地位的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有助于人们对自己的存在状态产生“警觉”,认清这种存在状态的实质,而且还能够使人们知道何以自己长期对这种存在方式麻木不仁,从认识当下人的“物化”的存在方式进一步去觉察当下人的“物化”的意识。

当然,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不仅揭露和批判了人的“物化”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物化”的意识,而且还探讨了如何“去物化”(de-reification)的问题。他对“去物化”的论述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提出了“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他论述“物化”的长篇论文《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第三节的标题定为“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是意味深长的。他认为,所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由于都渗透着“物化”的意识,或者说它们本身就都属于“物化”意识,从而不能指望依靠它们来为“去物化”指点迷津,他通过对“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的揭示,来说明资产阶级的“科学”面对“物化”是无能为力的。他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寄托于“无产阶级立场”不等于寄托于“无产阶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就是卢卡奇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对于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这一主体本身就足够了,或者说,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阶级地位就够了;然而,对于卢卡奇而言,却必须在“无产阶级”之后加上“立场”二字。无产阶级只有站

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它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立场与阶级不可分离,并且,它不是阶级的补语:立场构成阶级的本质部分。^{[6]27}在他看来,在“无产阶级的意识暂时还屈从于物化”^{[2]164}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这个人属于无产阶级的阵营,就认为他一定能洞见“物化”的存在方式并为改变这种存在方式而斗争,这是不现实的。而只有真正具有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才能担当起这样的历史使命。这种立场的确立,靠的并不是某种外在的必然性,这需要经历磨难和痛苦。当然,在他看来,要真正认识和改变这种“物化”存在方式,靠少数人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待于整个阶级的觉醒。他说:“随着无产阶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立场,这一过程也就开始了。”^{[2]279}他还强调说,关键在于,具有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不但能够认清那种“物化”的存在方式的实质,而且还会采取行动积极地去改变这种存在方式,他这样说道:“因为连无产阶级本身也只有当它采取真正实践的态度时,它才能克服物化。”^{[2]301}卢卡奇把认识和改变那种“物化”的存在方式与“无产阶级立场”联系在一起,把持有“无产阶级立场”视为是认识和改变那种“物化”的存在方式的前提,对当今的人们特别具有针对性。当今人们避开“立场”来谈论问题,包括如人的存在方式这样的与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问题,已成为时尚。实际上,正如卢卡奇所说的,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认识这才是最重要的。任何人要真正认识“物化”的存在方式,并想对此有所作为,就要如卢卡奇所说的那样,首先应当端正自己的立场,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 [6]周凡.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赵强]